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四辑

现代汉语杂论

王艾录/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现代汉语杂论

王艾录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杂论/王艾录著.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四辑)

ISBN 7-80211-031-9

I. 现… II. 王… III. 汉语—现代—文集 IV. H10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1800 号

现代汉语杂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楼 3 层(100035)

电 话:66562725 66562726(编辑部) 81551485(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ctp.com.cn>

E-mail: 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13.875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230.00 元(本册 28.60 元)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迸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

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4.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目 录

第一章 理据

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	(3)
试论真实理据和假定理据	(21)
入词语素义蠡测	(29)
关于语词的内部形式	(40)
意义支点词刍议	(50)
理据三问——与黎良军先生商榷	(57)
关于复合词内部形式的质疑——与刘叔新先生商榷	(62)
外来词的内部形式化倾向	(65)
试论相似思维在语言创造中的地位	(73)
字义不对号：一个词典编纂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81)
语素入词所发生的意义偏移现象	(87)
论偏正复词的内部形式特征	(94)
再论偏正复词的内部形式特征	(100)
定心结构里的语义干涉现象	(105)
语义干涉和义素脱落	(115)
探究复合词理据的基本途径	(126)

第二章 方言

祁县方言动词结果体的内部屈折	(145)
祁县方音辨正	(155)

祁县方言连读变调	(182)
“东观”读音辨正	(192)
太原清徐人如何识别阳平	(194)

第三章 语法

语用标准:句子正误的终极标准	(201)
词组和句子	(209)
义句与音句	(220)
汉语成句标准思考	(229)
“鸟飞”和“鸟飞了”	(236)
《汉语学习》读者来信	(242)
“假假话”的会话含义	(244)
问号、感叹号用法新探	(249)
语法三疑	(253)
逻辑谓语句	(259)
汉语语法类型管窥	(266)
说“了 ₂ ”	(275)
试论隐性语法关系	(279)
病句我见	(288)
立体语法提纲	(292)
比喻一议	(305)
非区别性定语	(308)
“动词+在+方位结构”刍议	(313)
复句标准浅谈	(322)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论杂议	(331)
组合相邻和非组合相邻	(339)

第四章 其他

隔音符号用途异议	(351)
札记三则	(355)
错读字音的现象可以休矣	(361)
语言文字里的习非成是现象	(367)
非常规教学法刍议——《现代汉语》教学体会	(380)
黄廖本《现代汉语》(增订二版)语法部分指瑕	(387)
评黄廖本《现代汉语》增订三版	(394)
白璧微瑕——对中央电大语法教材的几点意见	(420)
读书札记:著述玉瑕拉杂谈	(426)

第一章 理据

关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

摘 要:在语言理据研究中,存在若干有待商榷的问题,主要有:(1)任意性的构件是什么?在目前的研究中时而称“声音和意义”,时而称“名称和事物”等等,这影响着有关研究的科学性。(2)如何正确对待索绪尔的任意说?人们往往认为索绪尔在强调任意性的同时否认了理据性,其实不然。(3)单纯符号有无理据性?回答是肯定的,单纯符号没有内部形式,但不等于没有理据。(4)任意性和理据性在语言中的地位如何,它们不是水火不容,而是辩证统一。

关键词:任意性 理据性 象似性 内部形式 理据制约

一、问题的提出

结构语言学注重对语言的描写,追求“知其然”,而理据语言学注重对语言的解释,追求“知其所以然”。语言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但是人们对语言内部的奥秘所知尚少,对语言的解释力也十分有限,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对语言的“所以然”了解得不够。

探求语言理据,其内容非常复杂,但是其中最基本的则是语言符号的音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如徐通锵先生(2001)所说:“音义结合是语言符号的一种最基本的性质,也正由于此,语言符号中的音义关系也就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但也是最复杂的问题。”

语言符号是音义的结合物,那么这音和义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呢?这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话题。从古中国、古希腊哲学家关于唯名论和唯实论的辩论,到现代语言学家关于任意性和可论证性的争论,其间

虽然不断演绎引申,但是语言符号的音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儒者所争的核心问题。古今中外学术界基本有两派意见,一派是任意论,认为音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可论证;另一派是理据论,认为音义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可以论证。观点分歧了两千多年,至今没有取得共识,但任意性(arbitraire)和理据性(motivated)仍然是当代语言学中的两个核心问题。

19世纪初,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威廉·冯·洪堡特极力主张理据说,他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的影响》中对语言的理据性质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语言结构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相似,语言通过其结构激发人的最高级、最合乎人性的力量投入活动,从而帮助人们深入认识自然界的形式特征。”

瑞士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一方面继承了当时社会心理学派的哲学观点,一方面受瑞士正统经济学派华尔拉斯等人的影响,由经济学中的“劳动”和“工资”的任意关系得到启发,把经济学关于研究价值科学的方法运用于语言学,提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任意关系。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头等重要的”的原则,是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产生的根源。这一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引发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尽管有人持反对意见,但由于作为结构语言学的奠基人的索绪尔的巨大影响,未能打破任意说支配整个语言学的一统天下。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功能主义和认知科学的发展,有不少语言学家对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理据性再度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对自然语言的象似性赋予了高度重视,索绪尔的任意说遭到了空前的非难。迄今,已经分别在美国、意大利和瑞士举行了三次象似性国际研讨会。乌尔曼、海曼、Slobin等一批语言学家认为,自然语言的象似性具有遍布性,在语言中占有支配地位,从此将任意性视为语言符号的头等重要的原则的观点开始受到全面的挑战。

受欧美学术潮流的冲击,在我国的英语学界,象似性的理论也逐渐成为热门话题。许国璋(1988)、王寅(2001)、沈家煊(1993)、胡壮麟

(1994)、朱永生(2002)、严辰松(2000)等先生已有重要著述。而在国内的汉语学界,也有一些学者如石安石(1989)、徐通锵(1997)、徐德江(1999)、李葆嘉(1994)等先生,对任意性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新见。但是大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尚基本停留在对任意性的肯定或否定上面,而未能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对汉语的理据性进行正面的深入的研究,因而未能在这个问题上产生重大突破。从全局看,目前为止基本处于任意说支配整个语言学的一统天下。

“象似性”是英语 iconicity 的汉语对译,有学者管它叫“临摹性”、“拟象性”、“相似性”等,亦有学者径把它叫作理据性。象似性和理据性未尝不可被同时用来作为任意性的对立物,强调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的可论证性。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理据性的作用范围大于象似性,这是因为,理据性重在指出一切类型的语言符号发生、发展的自组织动因,而象似性重在指出语言的句段结构同人所经验的外部世界或人的认知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似关系,因此象似性的研究成果都可成为支持理据性的证据。目前为止的象似性研究基本限于句法平面,个别文章也注意到词平面,但只限于句段词(合成符号),例如“早晚”映照时间先后顺序,“天地”映照空间上下顺序(卢卫中,2002),其实质仍然属于句法平面。对于揭示单纯符号的理据,象似说就往往显得束手无策。

由于兴趣所驱,笔者对汉语理据做了一些探索工作。大致分两个阶段:80年代主要研究句法理据,提出了关于汉语成句的理论。1990年到1997年主要研究汉语语词理据,试释了近万条汉语复合词理据,代表作是《汉语理据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在此大量实践的基础上,从1997年开始,转入了对理据理论的探索,代表作是《语言理据研究》(二人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总览国内外理据(象似)研究方兴未艾,成果丰硕,但是我们认为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存在有待商榷的问题,兹扼要分阐如下。

二、任意性的构件是什么？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语音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他指出概念和音响形象都是心理的，“因此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101页）。他同时还创造了两个特色术语“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分别表示音响形象和概念。他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102页）

然而在长期以来关于任意性的研讨中，“能指”和“所指”常为别的术语所替代，许国璋（1988）将此概括为：“实证主义语言学家称之为音和义之间的关系；语言学家称之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现代分析哲学家称之为词与物的关系。”

在语言研究中，人们又往往加以不同的阐发，使任意性的构件已与索绪尔所规定的大不相同。这表现为：把相当于能指的分别指称为“声音、语音、音、符号、名称、名、命名、词……”，把相当于所指的分别指称为“意义、语义、义、事物、现象、客体、客观事物、外界事物、现实现象、物、事、思想……”，而且双双随意对应，呈现出狗牙交错的局面，比如称“声音和意义”、“名称和事物”、“符号和事物”、“声音和事物”、“词与事物”等等。

由于对构件的指称各不相同，所以造成了关于任意性（理据性）表述当中的许多混乱。

首先，“声音”和“音响形象”是不是等同关系？声音是物理的，音响形象是心理的，二者当然不能等同。外界事物和概念是不是等同关系？概念是人的认识的概括，是一种思维形式，它当然就不能等同于外界事物。声音和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任意的，有待研究，但是不能拿对声音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的理解替代索绪尔对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理解，因为这样做，会使关于任意性原则的讨论因偷换概念而失去应有的意义。

又如《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2000）说，语言符号的音义之

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任意的;同时又说,符号和自己所代表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任意的(28页)。那么,这两个任意关系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如果是一回事,是为什么?如果是两回事,又是为什么?所憾这些问题书中未能交代。

通常人们以语言单位之间的理据性反对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或者以符号与客体之间的任意性支持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其结果未能对科学研究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意识不到明确任意性构件的重要性在学术界带有普遍性,不断变换任意性构件所带来的理论上的漏洞,在学术界也带有普遍性。

其次,人们经常把符号同意义割裂开来,说,音和现实现象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意义是联系现实现象和音之间的桥梁。这样的说法表面上似乎可以设立一个完整的游戏规则,而实际上是经不住推敲的:既然音义结合成的符号在整体上同外界事物的关系是任意的,那么这个符号中的构成成员之一的“义”,又怎么能去给与自己结合在一起的“音”同外界事物搭桥呢?谁都知道,语言符号是由音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如果说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那么就得承认整个符号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如果说“义”和现实之间是有联系(非任意)的,那么就得承认以整个符号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有联系(非任意)的。我们认为符号不能是声音的等义词,正如索绪尔所说:“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但是在日常使用上,这个术语一般只指音响形象,例如指词(arbord等等)。人们容易忘记,arbord之所以被称为符号,只是因为它带有“树”的概念,结果让感觉部分的观念包含了整体的观念。”(102页)

有的著作甚至认为“意义不是语言符号所固有的”,只有把语言符号与特定的客观对象联系起来的时候,语言符号才获得意义。这样的提法是十分令人费解的,试问在与特定的客观对象联系起来之前的“符号”,或者说在获得意义之前的“符号”是什么?难道存在没有意义的语言符号吗?

至于有人以“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联系是可以论证的,有理据的”为